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西藏百年史研究

【上册】

白玛朗杰 孙 勇 仲布·次仁多杰 总主编

喜饶尼玛 主编 黄维忠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西藏百年史研究

【上册】

白玛朗杰 孙 勇 仲布·次仁多杰 总主编
喜饶尼玛 主编 黄维忠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总 主 编 简 介

白玛朗杰 藏族，1955年10月生，西藏丁青人，研究生学历。197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月参加工作。历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宣传处干事，理论处副处长、处长，林芝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林芝地委书记、人大地区工委主任等职。2008年1月至今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



总 主 编 简 介

孙 勇 汉族，1956年生，大专学历，研究员，中共党员。曾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国家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2012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史办主任。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客座教授，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主要从事社会发展、经济问题研究，并对教育、民族、宗教、哲学、政策、国际政治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参与或者主持过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独到的认识，提出过自成一体的学术观点，在区内外经济学界、藏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总 主 编 简 介

仲布·次仁多杰

藏族，1964~2015 年，大学本科学历。

生前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民族史研究学会副会长，西藏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第 10 届、11 届、12 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哲学、藏传佛教发展史、西藏近代史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专著有《雪域沉思录》《藏族哲学的理智》《新思维浪潮》《藏族文化与知识经济》《人类智慧概论》《西方哲学辞典》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江蓝生

主 任 郝时远

副 主 任 晋保平

成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旦增伦珠	尕藏加	郝时远	何宗英
胡 岩	江蓝生	晋保平	刘晖春
马加力	石 硕	宋月华	苏发祥
许德存 (索南才让)	许广智	杨 群	
扎 洛	张 云	仲布·次仁多杰	
周伟洲	朱 玲		

《西藏百年史研究》编委会

总顾问

洛桑江村 吴英杰 公保扎西

编委会

主 任 白玛朗杰

副主任 孙 勇 仲布·次仁多杰

编委会成员

喜饶尼玛 陈谦平 许广智 何宗英 黄维忠 王 川

统 稿

白玛朗杰 孙 勇 仲布·次仁多杰 何宗英

编 务

涂 健 郑丽梅

《西藏百年史研究》系列丛书课题负责人

仲布·次仁多杰

《西藏百年史研究》（上册）编委会

主 编 喜饶尼玛

副 主 编 黄维忠

编委会成员 喜饶尼玛 黄维忠 索文清 田 甜

上册主编简介



喜饶尼玛，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人。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藏学研究和教学，其科研成果《西藏历史地位辨》（合著）、《近代藏事研究》（专著）等曾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青年社科优秀成果

奖，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一等奖；先后至美国、意大利、瑞士、法国、埃及、南非、澳大利亚等 20 余个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访问。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多项。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民族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总 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 4000 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的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 7 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



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 1959 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开展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 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



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



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



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年12月北京

序一 穿越历史时空 开创美好未来

白玛朗杰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藏、蒙古、满、回等兄弟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缔造了统一的国家，组成了相互依存、同甘共苦、和睦共处的民族大家庭。

长期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注重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元朝中央政府把西藏地方划为十三万户，并由宣政院统一管理。其后的历代中央政府也都致力于西藏地方的治理，积极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历代中央政府均在西藏设有管理机构，制定章程并派员进藏督办地方事务，任免西藏地方机构的僧俗官员等。

在残酷、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过着极端贫困、悲惨的生活。帝国主义者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企图阻止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妄图侵占西藏这一中国的神圣领土，使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堕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在帝国主义的引诱和扶植下，西藏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亲帝分子走上了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邪路。在帝国主义分子的唆使和蛊惑下，他们发布破坏汉、藏民族关系的布告，赶走清朝驻藏军队，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人员，千方百计试图摆脱中央政府的管理，割断与中央的联系。他们违背中央政府制定的“不得私自与外国来往”的法规，擅自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妄图依靠外部势力实现“独立”的罪恶图谋。他们在西藏内部大肆迫害倾向中央政府的爱国人士，使之有的被革职、抄没家产，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逃往祖国内地。如第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